

从《在中国屏风上》透视毛姆矛盾的中国观

苑瑞瑶

湖南师范大学

DOI:10.12238/er.v7i11.5595

摘要：《在中国屏风上》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在结束为期四个月的中国之旅后写就的一部纪实性游记。一方面，毛姆力求以客观的笔触、平视的眼光向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另一方面，毛姆又始终无法摆脱传统“东方主义”叙事视角的桎梏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自大心态。因此，呈现在毛姆笔下的中国是一个集肮脏与腐朽、光明与温暖于一身的矛盾复合体。毛姆塑造的这一复杂的“中国形象”也正是其对中国所持的矛盾情感观念的投射。

关键词：《在中国屏风上》；毛姆；东方主义；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A

Perspectives on Maugham's Contradictory View of China from *On a Chinese Screen*

Ruiyao Yu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n a Chinese Screen* is a documentary travel book written by the famous British writer Maugham after his four-month trip to China. Maugham not only strived to present a real China to readers, but also cannot get rid of the constraints of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Therefore, China presented in his book is a complex of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both dirty and dark, but also bright and warm. This complicated "image of China" created by Maugham reflects his contradictory views of China.

Keywords: *On a Chinese Screen*; Maugham; Orientalism; Views of China

引言

《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是英国作家毛姆在结束为期四个月的中国之旅后写的一部纪实性游记。毛姆力图以自己的见闻和体验为主，尽可能客观地描绘一个真实的东方。然而，数年的东方之旅并不足以使毛姆能够透视整个东方，他笔下的东方沾染了诸多想象色彩。

一、传统的“东方主义”叙事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提出的一种理论。萨义德在文化层面建构出了东方和西方的对立：东方总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而西方总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数个世纪以来，这种对东方的刻板认知被嵌套进诸多外国作家对东方的描写中，东方世界成为一个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

作为一个西方作家，毛姆也很难避免“东方主义”的猎奇心理，从游记内容中可以看出他的东方主义认知视角以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自大心态”^[1]。在序言中，毛姆自述其写作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2]，而他却用大量的篇幅叙述在华侨居的外国人的生活，有关中国人的故事反而成了次要内容。重视刻画西人的见闻而淡化对中国人的描写也许是毛姆内心深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

的投射。例如，在《漂泊者》一文中，毛姆记录了一名在华旅居的英国人的生活，他说这个英国人“厌倦了文明世界，产生了一种远离陈规陋习的激情”^[3]。可见，不论是传教士还是毛姆本人，都有着传统的东方主义认知，默认西方世界是文明的，而将中国推到了西方的对立面，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未开化之地。

除了在游记中影射中国独立于文明世界，毛姆还在游记中反复描写中国街道的肮脏，城市的衰败以及神秘。《山城》一文中有对城中难闻气味的多次描写，比如：“难闻的气味折磨你的神经，犹如用陌生的乐器弹奏一首可怕的曲子所发出的声音击打着你的器官”^[4]。诸如此类的描写在这部游记中反复出现。由于近代中国工业化程度低，所以毛姆走过的这些中国城市大都保留了农业社会的风貌，城市的卫生状况不容乐观。从这一角度来看，毛姆对中国城市的描写有一定的写实成分。然而，这类描写的反复出现就有了强调的意味，作者似乎是想将中国城市与肮脏恶臭这类消极特质紧密关联起来，而这正是与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传统认知相契合的。

不论中国的城市在这位英国作家的笔下是肮脏还是神秘，它们的形象已然变成毛姆个人想象力的投射。毛姆所看

到的，“仍只是他自己乐于发现的东西^[5]。”毛姆对中国的这些想象恰好契合西方对东方的传统认知，其笔下神秘的东方和肮脏的东方并行不悖地成为西方对中国刻板印象的再现。

二、毛姆对“东方主义”叙事的反叛

虽然毛姆对中国的描写无法摆脱西方对东方世界固有的成见，但从总体上来看，毛姆对中国的书写态度是相对严肃而真诚的。他对中国人的生活有着细致的体察和描摹，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东方主义对东方世界的刻板印象。

在对中国景物的描摹上，毛姆塑造出了一个宁静和谐的“自然中国”。他这样写中国的江河：“黄色的江水在落日余晖中显出一种迷人的淡淡的色彩，江面水平如镜^[6]。”他形容中国的竹子“有一种出自名门的优雅，看上去宛如大明王朝一群倦怠的贵妇在大道边休憩^[7]。”在书写中国的自然风光之时，毛姆毫不吝啬对美景的赞美，并将中国的风景与英国的风物进行比对。毛姆笔下的中国不再是黑暗而危险的，而是变得“明亮而温暖^[8]”。这类风景书写向西方读者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也体现了毛姆平视东方世界的目光。

毛姆在游记中还塑造了诸多客居中国的白人形象。在传统书写东方的故事里，外国人特别是白人的形象总是正面的，而东方人却总是站在白人的对立面，负载着邪恶、狡诈等标签。然而在这部游记中，毛姆并未美化西方人的形象，而是揭露了他们的贪婪与冷酷，再现了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压迫。毛姆笔下的亨德森便是如此。亨德森自诩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毛姆却发现亨德森在大谈自由平等的同时又宣称“中国人总得要有主人^[9]”。传教士温格罗夫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他表面上赞颂中国人拥有善良的天性与崇高的品德，但毛姆却敏锐地观察到这位传教士内心对中国人充满了憎恶之情。

毛姆在中国接触的白人与自己没有语言上的隔阂，故而能够更为客观细致地刻画西方人在中国的生活图景。他通过多篇通俗故事来“探索深邃复杂的人性...从而对西方殖民者进行揭露与批判^[10]。”然而，毛姆却因为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无法与多数中国人直接交流，他所接触到的懂英文的中国人均是上流社会的成员，毛姆通过他们所间接了解的中国必然是相对主观而片面的。其中，毛姆对辜鸿铭的记述透露出他对中西思想与文化的深层思考。辜鸿铭向毛姆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黄种人能够造出跟白种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射击得同样准确时，那你们的优势何在呢^[11]？”或许，毛姆正是想借这位中国哲学家之口传达他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以及殖民统治的隐忧。

毛姆在记述西方人在中国生活以及刻画中国知识分子时都秉持了客观的原则，因此故事中的西方人与中国人摆脱

了传统文本中善恶二元对立的人设，人物形象更加生动而鲜活。毛姆对人物的刻画方式也是对传统东方主义叙事视角的突破。

三、毛姆的中国观及其成因

经过为期四个月中国之旅，毛姆对中国有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认知，《在中国屏风上》这部游记便是体现其中国观的集大成之作。结合这部游记来看，毛姆的中国观是矛盾且复杂的。一方面，毛姆尝试从传统的“东方主义”叙事中抽离出来，秉持着平视的眼光，力图向西方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的风景，人物在毛姆的笔下有着独特的个性，不再以落后、腐朽以及黑暗的面目出现；而西方殖民者的傲慢与贪婪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东西方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在毛姆的文本中得以消解。另一方面，毛姆始终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对东方世界固有的成见，他笔下的中国仍然与神秘、肮脏等“东方主义”叙事特质联系起来。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毛姆个人层面的原因。毛姆出身于英国中产阶级，接受的是传统的英式教育。在开始东方之旅前，他对中国的了解大多依靠欧洲旅行者的游记，而这些游记（影响力较大的有《马可波罗游记》和《曼德维尔游记》）的真实性以及对中国的还原度却一直令人质疑。我们有理由怀疑，在这些“先入之见”的影响下，毛姆对中国的认识往往难以完全突破传统“东方主义”认知的局限。这一点在游记中表现为毛姆对肮脏的环境、恶臭的气味以及神秘氛围的大量铺陈。而对这类事物的强调性描述无疑是对作者本人既定“东方主义”认知的呼应。再者，由于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且语言上又存在隔阂，毛姆对中国的理解便只能依托于在华侨居者以及少量中国人经历的自述。对此，吴超平指出，“毛姆的观点毕竟植根于异质文化的土壤，而且他的观察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式的，因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也就无法避免^[12]。”更重要的是，透过他人的经历及见闻去了解中国的方式终究是间接的，不同国家，不同阶层的人所认识到的中国也是大不相同的。从毛姆的游记可以看出，他直接接触到的中国人实在太少，反而是对外国人的叙述占了很大篇幅。如此一来，毛姆对中国的认知便较为片面，其塑造的“中国形象”的客观性也大打折扣。

二是社会层面的原因。毛姆来华之际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时期。一战之后，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在战争的摧残中国力渐显颓势，欧洲各国战后的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战争引发了不少欧洲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发展的反思，而东方这个一直被西方置于对立面的世界很自然地成为西方的参照。顾彬认为，那时西方人“把视线移向东方的目的是想通过东方这个‘异’来克服他们自身的异化^[13]。”那时有许多欧洲作家和旅行家来亚洲旅居，意图通过

书写东方世界为西方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然而，这些作家和旅行家大多是为帝国主义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摇旗呐喊，他们书写东方故事的目的也只不过是西方在亚洲国家的殖民寻求一个合理的借口。有学者指出，“毛姆借助旅行书写中关于近代中国之破败的表征隐晦地表达战后英国的焦虑，同时还借助英国的绅士标准规训殖民官员，以图维持国家在远东的政治版图与权力图景^[4]。”或许毛姆书写中国衰败而肮脏的一面的确有现实层面的考量，他也许想要以中国由盛及衰的这一前车之鉴来警示英国。战争会让国家的发展陷入迟滞，而清末民初的中国恰好饱受战火，民众饱经战乱流离之苦，国力也江河直下。书写中国衰败的现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毛姆对于英国前途命运的隐忧。值得注意的是，毛姆显然不是殖民者的喉舌。如果他想要维护英国的海外殖民统治，他大可以遵循主流观念，按照政治需要去塑造一个需要被西方“拯救”的中国形象来维护殖民统治的正义性，又何必试图去书写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且，他对诸多殖民官员的批判是不加掩饰、鞭辟入里的，而对生活在底层的劳苦民众又是充满同情的，故而毛姆书写中国的目的应该不是维系英国的“政治版图与权力图景”，而是通过展示中国的现状为英国的发展提供参照和借鉴

四、结语

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外国作家，毛姆跳出了当时西方社会对东方固有的成见，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独到的眼光以及相对亲善的态度去书写中国。毛姆笔下的中国是鲜活而生动的，它不再是西方的注脚，也不再是一个需要西方文明去拯救的蛮邦。《在中国屏风上》这部游记记录了中国的风景名胜、哲学思想以及生活在中国的中外人士，给西方读者呈现了一个别样的中国。然而，毛姆笔下的中国终究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塑造的，它与真实的中国依然有一定的距离。游记中的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与自我对立并确

认自我的一种象征^[5]”隐含着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毛姆始终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桎梏，为西方读者呈现一个真实而客观的中国。传统的“东方主义”叙事视角明显相悖于毛姆“提供中国的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的写作目的，而二者的交织使得真实与想象并存于毛姆塑造的“中国形象”之中，这一复杂的“中国形象”也正反映了毛姆矛盾的中国观。中国之于毛姆，始终是屏风上的浮光掠影，仓促间的走马观花。

[参考文献]

- [1](英)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在中国屏风上[M].唐建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2]丁美杰.毛姆小说中东方观的嬗变[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3,42(05):119-122.
- [3]顾彬.关于“异”的研究[M].曹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4]谭晓亮.迷思与忧思:毛姆东方书写中的帝国想象与帝国焦虑[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3,21(02):138-143.
- [5]吴超平.试论毛姆对中国文化的误读[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127-130.
- [6]吴晓东.毛姆的中国想象[J].名作欣赏,2010,(25):44-45.
- [7]张和龙.跨文化生存的困境——毛姆涉华题材短篇小说解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05):116-121+160.
- [8]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苑瑞瑶(2000.04-)女,汉族,山东滨州人,硕士研究生,湖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